

刘汉成,关江华. 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连片贫困区农户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湖北大别山片区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2018,46(2):264-268.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8.02.066

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连片贫困区农户 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以湖北大别山片区为例

刘汉成¹, 关江华²

(1. 黄冈师范学院商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2. 黄冈师范学院旅游文化与地理科学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湖北大别山地区贫困农户进行抽样调查,并建立有序 Logistic 模型,从微观视角研究贫困农户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当前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为 62.16%;影响农户精准扶贫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为主导产业、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年龄、健康状况、就业地点、地理位置、银行小额贷款、贫困户识别精准度、对口单位帮扶措施;其中,主导产业、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对口单位帮扶措施等因素呈显著正影响,其他因素呈弱显著影响。因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健全与完善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条件建设;培育与壮大贫困地区主导产业的参与主体;鼓励与推动贫困农户发挥主观能动性;着力与强调精准扶贫的准确性和针对性。

关键词:问卷调查法;精准扶贫;满意度;影响因素;有序 Logistic 模型;大别山地区;对策

中图分类号: 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8)02-0264-04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2014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了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2015 年 10 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精准扶贫,2016 年 1 月精准扶贫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发展迎来了重要发展机遇期^[1],精准扶贫以全新的扶贫方式出现,从以往单纯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对于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直接补助,发展为现在的以精准扶贫项目为主的新型扶贫方式。

各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扶贫脱贫模式试点,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对脱贫、扶贫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多,在研究贫困地区区域发展和农民增收影响因素方面,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差异等因素,陈凡认为制约贫困地区区域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源禀赋差异且总体呈现资源配置低效率的稳定均衡状态^[2]。随后的研究则聚焦在贫困地区教育水平、资金短缺、能力培养与积累等因素上,黄承伟等认为,由于贫困地区经济落后导致教育水平低下,发展资金短缺、能力培养和积累相对不足,反过来使得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更加缓慢,由此就出现恶性循环^[3]。近期,研究人员对贫困地区农户的研究重点在于对农户脆弱性评价及影响因

素的研究,杨龙等认为,脆弱性既是风险的产物,也是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和行动的产物,脆弱性的程度依赖于风险的特点和家庭抵御风险机制,并提出影响农户家庭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层和相应指标层^[4]。在研究连片特困区农户贫困及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有如下成果,例如,李贝等基于武陵山地区的调查,应用 Logistic 模型分析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的主要因素,并得出如下结论:从户主层面来看,女性、文化程度低、兼业时间短的农户更容易陷入贫困;从家庭基本特征层面看,耕地面积少的农户家庭更容易陷入到贫困状态;从家庭生命周期层面来看,拥有未成年子女数量少、遭受过重大疾病或伤残的农户,其家庭贫困的可能性更大^[5]。另有少数学者从精准扶贫绩效角度来探索农户脱贫增收问题,陈升等认为,现阶段影响农户脱贫的主要原因在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 4 个层面的 9 个因素;且各因素重要性不同,其中核心因素是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与因村派人精准,妥善解决这些问题能够提高精准扶贫的针对性,实现农户脱贫增收的目的^[6]。李裕瑞等对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的模式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实现可持续精准扶贫模式^[7]。在精准扶贫研究方面,王思铁从政策解读、实践经验、工作难点、路径选择等方面给予了研究^[8]。关于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本研究以各农户对精准扶贫的态度所占比重计)的研究涉猎不多,更多的研究关注合作社、社会工作、农户在精准扶贫中各主体利益联结关系等方面。赵晓峰等提出整合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合作社进行对接,再吸纳贫困农户的自有资源,使合作社与普通农户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9]。袁君刚认为,社会工作完全可以运用自身的专业性和职业性优势,通过参与“精准扶贫”实现农村贫困治理水平的提高^[10]。卢冲等利用四川藏区 23 县

收稿日期:2017-04-17

基金项目:湖北省软科学项目(编号:2016ADC058);黄冈师范学院高级别培育项目(编号:201616803)。

作者简介:刘汉成(1970—),男,湖北天门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E-mail:laoliu1970@163.com。

通信作者:关江华,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土地资源管理、土地经济与政策研究。E-mail:guanjh9947@126.com。

(市)1 320 户的调查数据构建双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贫困牧民参与旅游扶贫对其脱贫具有积极作用^[11]。

综上所述,尽管对农户精准扶贫满意度问题的研究有一些进展,但在以下方面还有改进空间:一是研究区域大多基于全国范围的面上分析,对连片特困地区关注不够,尤其是从精准扶贫对连片特困区农户脱贫增收的影响视角开展的研究不足;二是对贫困地区农户的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及不稳定因素的揭示和辨析不够,未能深层次探究导致精准扶贫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带动效应不佳的因素;三是受数据来源的制约,研究多侧重于定性分析,运用模型及定量分析尚显薄弱,使得研究结论缺乏严谨的数据支撑,相关政策的制定缺乏现实针对性。本试验针对以上研究不足展开探讨。当前,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的主战场,这些区域的贫困农户能否脱贫增收是衡量精准扶贫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本研究基于农户微观视角,通过构建农户对精准扶贫的满意度评价模型,利用湖北大别山地区 10 个县(市、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的满意度,厘清影响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为地方政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收集处理

1.1 研究区域概况

全国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有 14 个、贫困县有 832 个,其中大别山片区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横跨鄂豫皖(湖北、安徽、河南)3 省、6 个地级市(黄冈、孝感、随州、安庆、六安、信阳),在大别山片区 45 个特困县中,湖北占了 16 个。湖北省黄冈市作为湖北省下辖的地级市,国土面积 1.7 万 km²,辖区户籍人口 750 多万。在湖北 17 个地级市中,2015 年黄冈市人均 GDP 仅为 2.5 万元左右,在全省排名第

16 位,其中贫困县有 6 个,贫困人口达 102 万多。本研究选择湖北大别山片区黄冈市作为调研地,主要考虑黄冈市作为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县集中分布的地区,调研数据具有代表性。

1.2 调查数据收集与处理

为了获得相关数据,以大别山贫困区县的地方为依托,笔者所在课题组于 2016 年 12 月下旬,分 5 个调查小组对黄冈市所属 10 个县(市、区)43 个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每个村随机抽取 10 户进行入户调查,共计 430 户,人口 1 547 人,发放问卷 4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13 份,问卷有效率 96.05%,超过模型所需要的样本数。在进行数据处理前运用 SPSS 17.0 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对原始数据进行可行测度监测,检测到克隆巴斯系数为 0.785(0.5),表明原始数据能反映主体特征的真实值。

2 变量选择与计量模型构建

2.1 变量选择与赋值

本研究选择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四大特征变量,分别为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变量、基础条件特征变量、外围支持特征变量和精准扶贫认知特征变量,每个特征变量又包含若干子变量。其中,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变量包含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数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就业地点 8 个子变量;基础条件特征变量包括地理位置、主导产业 2 个子变量;外围支持特征变量包括财政扶贫资金投入、银行小额贷款 2 个子变量;精准扶贫执行特征变量包括精准扶贫政策了解程度、贫困户识别精准度、对口单位帮扶措施 3 个子变量。各变量赋值及预期影响方向见表 1。

表 1 变量赋值及预期影响方向

特征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预期影响
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变量	性别	女=0;男=1	+
	年龄	20 岁及以下=1;21~40 岁=2;41~60 岁=3;60 岁以上=4	-
	婚姻	未婚=0;已婚=1	+
	文化程度	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专及以上=5	+
	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差=0;健康状况好=1	+
	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庭劳动力人数(人)	待检验
	农民人均纯收入	2016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
	就业地点	外地就业=0;本地就业=1	待检验
基础条件特征变量	地理位置	区位条件差=0;区位条件好=1	+
	主导产业	无主导产业=0;有主导产业=1	+
外围支持特征变量	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财政实际到村资金:50 万以下=1;50 万~99 万=2;100 万~200 万=3;200 万以上=4	+
精准扶贫执行特征变量	银行小额贷款	无小额贷款=0;有小额贷款=1	+
	精准扶贫政策了解	不了解=1;一般=2;非常了解=3	+
	贫困户识别精准度	不精准=0;精准=1;	+
	对口单位帮扶措施	无措施=0;有措施=1	+
农户满意度	农户参与精准扶贫满意度	不满意=0;不清楚=1;满意=2	

2.2 计量模型构建

由于被解释变量分满意、不清楚、不满意 3 类情况,且取值存在较强的排序关系,因此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量化分析影响贫困农户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基于上述变量选

择,构建第 i 个贫困农户的满意度模型:

$$satisfaction = \sum \beta x_i + \varepsilon_i。$$

式中: x_i 为解释变量向量, $x_i = (1, x_{i1}, x_{i2}, \cdots, x_{ik})$; β 为回归系数向量, $\beta = (\beta_0, \beta_1, \beta_2, \cdots, \beta_k)$; ε_i 为随机变量。由于难以获

得衡量贫困农户参与精准扶贫满意度的连续性数据,因此把贫困农户的满意度选择作为代理变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从基础条件特征、外围支持特征及精准扶贫执行特征等方面选取 7 个因素对农户开展满意度调查,即扶贫政策知晓、产业扶贫带动、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小额贷款、医疗救助、基础条件改善、教育与培训就业。样本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统计情况见表 2。

特征类型	满意		不清楚		不满意	
	户数	比重(%)	户数	比重(%)	户数	比重(%)
扶贫政策知晓	383	92.74	11	2.66	19	4.60
产业扶贫带动	211	51.09	30	7.26	172	41.65
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170	41.16	36	8.72	207	50.12
小额贷款	87	21.07	45	10.90	281	68.04
医疗救助	326	78.93	0	0.00	87	21.07
基础条件改善	351	84.99	0	0.00	62	15.01
教育与培训就业	269	65.13	11	2.66	133	32.20
精准扶贫总体		62.16		4.60		33.24

注:资料来源于调查整理所得。

表 3 基于样本模型估计结果

特征类型	变量名称	偏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	P 值
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变量	性别	0.352	0.452	2.137	0.181
	年龄	0.078	0.004	4.369	0.023 **
	婚姻	0.013	0.147	0.204	0.627
	文化程度	0.156	0.038	2.751	0.934
	健康状况	0.205	0.047	2.142	0.087 *
	家庭劳动力数量	-0.049	0.174	0.365	0.531
	农民人均纯收入	0.005	0.035	2.467	0.164
	就业地点	0.039	0.015	2.361	0.074 *
	地理位置	0.024	0.012	3.574	0.045 **
基础条件特征变量	主导产业	0.245	0.014	4.528	0.002 ***
	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0.089	0.011	3.426	0.001 ***
外围支持特征变量	银行小额贷款	0.036	0.021	5.345	0.021 **
	精准扶贫政策了解程度	0.007	0.036	1.324	0.195
精准扶贫执行特征变量	贫困户识别精准度	0.048	0.024	5.642	0.032 **
	对口单位帮扶措施	0.135	0.031	6.342	0.003 ***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3.2.2 被调查者的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 0.205,且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健康状况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从调查情况来看,各地政府制定并落实医疗救助精准扶贫实施方案,贫困农户参加新农合比例达到 100%,且免交参合费用,大病住院治疗报销比例提高至 90%,五保户报销比例达到 100%。有少数农户因长期有大病或慢性疾病,尽管可以报销绝大部分医疗费用,但因健康问题影响工作,从而导致收入低下陷入贫困。农户健康状况越好,就越有充沛的脑力和体力去从事各项工作,收入高且持续,满意度就高;相反,健康状况越差,不但要支付医药费,同时因健康影响工作导致收入下降,因病致贫现象明显,满意度则低。

从表 2 可以看出,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总体满意比重为 62.16%,不满意为 33.24%。从具体指标满意度调查来看,满意度在 60% 以上的指标有 4 个,分别是扶贫政策知晓、基础条件改善、医疗救助和教育与培训就业,满意度依次为 92.74%、84.99%、78.93%、65.13%;满意度在 60% 以下的指标有 3 个,分别是产业扶贫带动、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和小额贷款,满意度依次为 51.09%、41.16%、21.07%。从以上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来看,表明现阶段我国精准扶贫项目推进的进度和效果还存在较大差异,须要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3.2 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运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有序 Logistic 回归,从检验统计量来看,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回归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被调查者的年龄、健康状况、就业地点、地理位置、主导产业、财政扶贫资金投入、银行小额贷款、贫困户识别精准度、对口单位帮扶措施等 9 个因素对贫困农户精准扶贫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3.2.1 被调查者的年龄 “年龄”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 0.078,且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年龄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年龄越大的农户对国家扶贫政策及执行理解更深刻,时常把现在与过去进行对比,普遍认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满意度相应要高;相反,年龄越小的则没有该经历和体会。

3.2.3 就业地点 “就业地点”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 0.039,且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就业地点对满意度有重要影响。本地就业的农户能亲身经历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全过程,且明确在哪些方面受益,受益多少,因而,满意度高;反之,外地就业的农户,由于无法参与精准扶贫的各类项目,满意度则低。

3.2.4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主要涉及贫困农户周边基础设施等,这一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 0.024,且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地理位置对满意度有重要影响。从调查情况来看,区位优势较好的村普遍都有硬化的通村公路,有安全的农村电网,有入户的广电通信光纤,有清洁饮用水和生活能源,有生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有村卫生室、农家书屋、文化广

场和群众服务中心,部分村已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区位条件较差的村尤其是极少数村还没有通水泥路,路况较差,出行极不方便;部分村无独立卫生室,还存在几个村合用一个卫生室,且卫生室条件较差;有的村宽带普及率低,个别村还没有安全饮用水。地理位置优越的村庄,各类产业发展都具有先天优势,农户就业渠道多,收入增长快,满意度高;相反,地理位置差的村庄,交通闭塞,产业单一,农户增收门路少,满意度低。

3.2.5 主导产业 “主导产业”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 0.245,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主导产业是影响满意度的关键因素。据调查,农户满意度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主导产业,且这些主导产业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效应,贫困农户广泛参与如种植、加工、运输、批发零售、乡村旅游、农家乐、特色美食等,农户就业效果好,农民增收快,满意度高。反之,满意度低的则表现为多种形式,一些村本地主导产业还没有形成无法带动;一些村虽有一些特色产业,但产业缺乏品牌,生产规模小,吸纳就业能力不强,带动贫困农户增收效果不明显。

3.2.6 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 0.089,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国家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对满意度至关重要。从调查情况来看,贫困农户虽然对国家财政加大扶贫资金投入表示欢迎,但对投入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还不满意。此外,国家财政对各村实际到村资金存在较大的差异,如 2016 年湖北省红安县石家岗村实际到村资金为 247.74 万元,小丰山村为 192.79 万元;湖北省团风县杜堡村和马家塆村实际到村资金均为 100 万元,而张冲村和孙家冲村仅为 40 万元。由此可见,到村资金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农户满意度。财政扶贫资金投入越多的村庄,其面貌变化越大,产业发展效果越好,农民受实惠越多;反之,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少的村庄,村庄变化不大,农户受益较少。

3.2.7 银行小额贷款 “银行小额贷款”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 0.036,且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银行小额贷款对满意度具有正向效应。从调查情况来看,贫困农户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缺乏扶贫信贷投资平台,贫困农户得不到小额贷款的支持;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贷款门槛过高,金融部门审核过于严格,出于资金安全考虑,只愿意将资金贷给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种养殖大户,缺乏对生产规模小、收益低的贫困农户贷款的积极性。

3.2.8 贫困户识别精准度 “贫困户识别精准度”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 0.048,且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贫困户识别精准度对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贵在贫困户识别精准度,贫困户识别精准度高的村庄,针对性就强,扶贫效果就好;反之,精准度低的村庄,扶贫矛盾和争议大,政策执行难,往往出现非贫困户得到了资助,贫困户相反被排斥,则满意度必然低。

3.2.9 帮扶措施 “对口单位帮扶措施”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 0.135,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口单位帮扶措施对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口单位真心帮扶且措施得当的,贫困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扶,脱贫增收效果好;反之,对口单位帮扶措施蜻蜓点水,做表面文章,贫困户意见很大,满意度自然就低。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政府制定精准扶贫策略、实现贫困农户真正脱贫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大别山贫困连片地区贫困农户的调查分析表明,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总体满意度一般,总体满意比重为 62.16%,不满意为 33.24%。影响农户满意度的因素差异性较大,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年龄、健康状况、就业地点、地理位置、主导产业、财政扶贫资金投入、银行小额贷款、贫困户确定精准度以及对口单位帮扶措施等 9 个变量是影响农户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而性别、婚姻、家庭劳动力数量、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精准扶贫政策了解程度则影响不显著。因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 健全与完善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对贫困农户的调查中发现,加快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扶贫脱贫。既要加强硬件条件建设,如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把资金和项目优先安排到贫困村,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到村到户,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条件环境;又要加强软件条件建设,包括宽带网络建设、农村电商平台建设、市场信息体系建设等。

4.2 培育与壮大贫困地区主导产业的参与主体

重点培育并壮大主导产业的核心参与主体,主要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组织等。同时,引导并规范核心主体与农户建立稳定且有效的合作关系,带动贫困农户脱贫增收。

4.3 鼓励与推动贫困农户发挥主观能动性

各级政府要教育贫困户克服“等、靠、要”思想,鼓励贫困户解放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通过不懈努力脱贫致富。

4.4 着力与强调精准扶贫的准确性和针对性

首先着力精准扶贫对象识别的准确性。既要做到识别方法要精准,又要做到识别过程要透明公正,将结果公诸于众,接受群众监督。其次要强调精准扶贫政策对症下药,项目安排要精准,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因户施策,贯彻落实扶贫项目精准。再次是资金使用的精准,采取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多元投入机制。最后是实施方式要精准,针对每户的特殊情况和致贫原因分类实施,实现“私人订制”式帮扶。

参考文献:

- [1] 戈大专,龙楼花,屠爽爽,等. 新型城镇化与扶贫开发研究进展与展望[J]. 经济地理,2016,36(4):22-30.
- [2] 陈凡. 贫困地区农户经济行为与贫困机理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1998(5):3-9.
- [3] 黄承伟,陆汉文. 贫困村互助资金的安全性与风险控制——7 省 18 个互助资金试点的调查与思考[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9(5):14-20.
- [4] 杨龙,汪三贵. 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0):150-156.
- [5] 李贝,李海鹏.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61-67.
- [6] 陈升,潘虹,陆静. 精准扶贫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东中

徐 磊,郭锦塘. 质量控制、供货能力对“农超对接”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合作社视角[J]. 江苏农业科学,2018,46(2):268-273.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8.02.067

质量控制、供货能力对“农超对接”参与行为的影响 ——基于合作社视角

徐 磊^{1,3}, 郭锦塘^{2,3}

(1.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南昌 330045; 2. 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南昌 330045;

3. 江西农业大学农村经济研究所,江西南昌 330045)

摘要:质量控制、供货能力是合作社实现“农超对接”、提高参与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利用江西省 242 个合作社数据,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分析合作社具体的质量控制行为和供货能力情况对其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参与程度的影响。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拥有生产标准和建立了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合作社更容易实现“农超对接”;建立可追溯体系的合作社参与程度会更高;进行产前安全培训既有利于合作社实现“农超对接”,又能提高“农超对接”的参与程度;合作社供货规模越大,实现“农超对接”可能性越高,参与程度越深;加强合作社配送能力可以促进合作社实现“农超对接”;统一施肥影响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的增加;而合作社农产品品种越多,其参与“农超对接”的程度会越低。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合作社;质量控制;供货能力;“农超对接”;影响因素;Heckman 模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参与程度;供货规模;配送能力;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8)02-0268-06

近年来,农产品流通中出现季节性、局部性的生产者“卖难”和消费者“买贵”以及“两头诉苦,中间喊冤”的问题^[1-2],同时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也逐步提高。而“农超对接”能够较好解决“卖难买贵”问题,有效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3]。在此背景下,国家大力支持超市同农产品生产者开展“农超对接”。本研究利用对江西省 242 家具有代表性的生鲜农产品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分析合作社内部质量控制行为、供货能力对其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的影响。根据现阶段的研究成果,消费者如今更加注重农产品的质量,对具有质量安全可追溯标识的农产品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4]。超市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农产品销售的主要载体^[5],即“农超对接”将成为农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而超市作为零售商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就需要供应商满足超市不确定的订货需求^[6]。因此,合

作社需要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提高供货能力^[7]。综合分析,可以预测合作社为了参与“农超对接”,提升参与程度,须要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供货能力。然而,具体是何种质量控制行为、哪一方面的供货能力影响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以及参与程度,本研究将进行详细的实证分析。

1 文献回顾

众多学者就“农超对接”展开了诸多研究,大多学者认为我国分散且传统的小规模农户难以同超市直接对接,而农民合作社则可以整合分散的农户,从而有效参与“农超对接”^[8]。就“农超对接”模式中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研究,中国超市数量的持续增长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空间,超市凭借其购物环境优良、食品安全让人信赖将会成为农产品销售的主要载体^[5]。甘文霄等研究“农超对接”模式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并分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主体各方的义务以及责任^[9]。“农超对接”供应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可以更好地控制农产品的品质^[10],超市对“农超对接”供应链的治理模式则是依据超市内部质量检测成本的大小进行选择。“农超对接”中零供双方关系博弈,生产者选择是否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取决于生产该质量等级商品的成本和超市愿意支付该等级质量的农产品价格^[11]。部分学者

收稿日期:2016-08-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463026,71403112);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15GL07,14GL19)。

作者简介:徐 磊(1992—),男,安徽巢湖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企业管理研究。E-mail: xuah92@163.com。

通信作者:郭锦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产品营销研究。E-mail: gjtyh40@sohu.com。

西部的案例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2016(9):88-93.

[7] 李裕瑞,曹 智,郑小玉,等. 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的模式与可持续途径[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3):279-288.

[8] 王思铁. “十三五”时期四川脱贫攻坚构思[J]. 党政研究,2016(1):22-28.

[9] 赵晓峰,邢成举. 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

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2016(4):23-29.

[10] 袁君刚.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比较优势探索[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7-22.

[11] 卢 冲,耿宝江,庄天慧,等. 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及行为研究——基于四川藏区 23 县(市)1 320 户的调查[J]. 旅游学刊,2017(1):64-76.